

Doi:10.20063/j.cnki.CN37-1452/C.2024.03.005

# 孔氏家学及其对儒学发展的影响(上)

冀玉珍<sup>a</sup>, 霍俊国<sup>b</sup>

(曲阜师范大学 a. 图书馆; b. 文学院, 山东 曲阜 273165)

**摘要:**孔氏家学的形成历经了漫长的岁月,从孔子之前的萌芽阶段,到孔子开创形成阶段,再到秦至唐代的发展完善阶段,以及宋至清朝的繁荣阶段,孔氏家学不断发展壮大,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体系。孔氏家学以传孔子之道为核心,涵盖了经史子集等多个领域,其内容主要有治经和诗礼之教两个方面。孔氏家学,本质上是在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长期积淀而形成的一种文化心理结构,它源于对先祖孔子的深厚崇拜。

**关键词:**孔氏家学;孔子之道;孔子崇拜;儒学

**中图分类号:**B22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4)03-0029-07

## 一、孔氏家学的形成

有观点认为孔氏家学始自孔子,成于子思;也有观点主张西汉时形成一派;还有观点认为是魏晋时期形成。尽管各说纷纭,但笔者认为在孔子之前,孔氏家学应已有萌芽。这是因为,孔子七世祖正考父已从事《诗经》的校雠,正考父也由此被誉为“我国有史记载的最早的一个知名的校雠家”<sup>[1]</sup>。据《国语·鲁语下》载:“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韦昭注:“正考父,宋大夫,孔子之先也。”又引《毛诗·商颂序》云:“微子至于戴公,期间礼乐废坏。有正考甫者,得《商颂》十二篇于周之大师,以《那》为首。”又引郑玄笺云:“自考父至孔子,又亡其七篇,故徐五耳。”<sup>[2]</sup>关于正考父,《孔子世家谱》载:“正字考父,为宋卿,佐戴、武、宣公,三命益公(恭),有圣人之德。适周,得商颂十二篇于太师,归以祀其先王。至圣祖编诗,又亡七篇。生子嘉。”以后嘉生木,木生罍,罍生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纥,纥生孔子”<sup>[3]</sup>。孔子删述《诗经》或受其七世祖正考父影响,故将正考父的校雠活动视为孔氏家学的萌芽期并不为过。因此,孔氏家学的衍变至少可分为四个阶段。

开创形成期,是孔氏家学奠定与形成的关键阶段。代表人物孔子和子思,在这一阶段发挥了

重要作用。孔子删述六经,通过教授《诗》《书》礼乐,为孔氏家学开创了先河。而子思则“祖述父师之意”,创作了《中庸》,进一步确立了以传承孔子之道为核心的孔氏家学体系。这一阶段的代表作主要有《诗》《书》《礼》《乐》《易》《春秋》《论语》《中庸》等,这些经典著作均为后世儒家和孔氏家学所尊崇,被誉为“群言之祖”。

秦至唐代的发展完善期。在这一阶段,孔氏家学沿着训释五经和创作艺文两条路径稳步发展。随着古文《尚书》《孝经》等文献的发现,孔氏家学的内容不断丰富,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学派体系,与朝廷所倡导的儒学相比,自成一派。这一时期,孔氏家学涌现出众多杰出代表人物,如孔鲋、孔安国、孔猛、孔僖、孔季彦、孔融、孔衍、孔琳之、孔稚珪、孔慎、孔晔、孔颖达等。他们的著述广泛涉及经史子集,代表性作品包括《孔丛子》《孔子家语》《古文尚书》《尚书注疏》《五经正义》《孔氏志怪》《夏侯鬼语记》以及诸多策、赋、骈文作品等。这些著作不仅丰富了孔氏家学的内涵,也为后世儒家学派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宋至清朝的繁荣期。尽管理学、心学等思潮对其产生了一定影响,但自唐代起,孔子的神圣地位迎来了新的里程碑式提升<sup>①</sup>,孔氏家族对圣祖孔子

收稿日期:2024-02-07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孔府档案文学书写研究”(19YJA751017)

作者简介:冀玉珍(1975—),女,山东聊城人,法学硕士,曲阜师范大学图书馆副教授;霍俊国(1975—),男,山东聊城人,文学博士,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sup>①</sup>关于孔子何时被神圣化,学界有不同观点。有学者认为,孔子被神圣化始自汉代。但诚如陈东先生在《释奠制度与孔子崇拜》(载《国际儒学研究》2007年)一文所言,与春秋时期相比,在汉代,儒家孔子只是尊而不贵,其地位并没有明显上升。孔子被神圣化与孔子祭祀仪式上升为国家层面的释奠大典以及相关制度的逐步完备有关。本文从陈东先生观点,认为孔子被神圣化始于汉末,自唐代起,则迎来了新的里程碑式提升。关于孔子神圣化过程,后文另有论述。

的崇拜愈发强烈,这进一步强化了孔氏家学祖述家法、传承孔子之道的核心地位。此阶段,孔氏家学不仅继续沿着训释五经和艺术创作的道路上发展,还开创了撰写家谱、家族文献志和圣迹图等新路径,旨在圣化先祖孔子并促进家族和睦。这一时期,孔氏家学人才济济,著述丰富多样,代表人物有“三仲”、孔传、孔文卿、孔承倜、孔毓圻、孔尚任、孔传铎、孔广森等,他们的代表作包括《书说》《论语说》《诗经代言》《诗声类》《周易卮言》《公羊春秋经传通义》等,以及众多家谱、文献志、圣迹图、诗文总集和别集等。这些作品不仅展现了孔氏家学的深厚底蕴,也为后世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自孔子七世祖正考父校勘《商颂》至清代康熙时期,历经近两千四百载。其间,孔鲤、子思、孔安国、孔融、孔颖达、孔巢父、孔武仲等经学文学之翘楚辈出,著述丰富。清人孔继汾在《阙里文献考·孔氏著述》中言:“自先圣删述六经以垂教万世……后之子孙守而弗失,凡有著作,类不敢鹜隐怪而背遗经。家乘所传,章章可考也。”<sup>[41]</sup>他按照经、史、子、集分类,详细记载了自孔子至七十代衍圣公孔广柴间的二百三十一部著作。周洪才先生的《孔子世家艺文志》则更为详尽,载录孔子家族正式作者七百余人,著述达两千余种。若将附带提及及编入“外编”“附录”的孔姓人士,以及家谱“余录”所列的孔氏谱牒计算在内,则涉及三千余位人士,著述种类亦近三千。由此可见,曲阜孔氏家学传统源远流长,底蕴深厚,独具特色。

## 二、孔氏家学的主要内容

### (一)首在治经

作为圣人之后,孔氏家学底蕴深厚,令孔氏子孙倍感自豪。他们视研读先祖遗书、承继家学、传承孔子之道为己任,自觉担当起这一神圣使命。在孔氏族人的观念中,孔氏家学起源于孔子,其核心便是五经与《论语》。因此,传承家学、弘扬孔子之道,首要任务便是深入研究经典。孔尚任在《阙里志·著述志》中说:“五经,三代遗文也。自删定而后,遂为阙里阐教之书。秦火方炽,藏之者子鱼;鲁壁既发,解之者子国。家庭授受,代有名作,虽偏全杂见,而渊源有本,诵法传习,实天下之同文,宁第孔氏一家言哉!”<sup>[5]476</sup>孔尚任的这番话,正是对前述观念的深刻阐释,充分表达了阙里孔氏子弟的共同心声。这段话主要蕴含了两层含义。

首先,五经和《论语》不仅承载着孔子之道,是

孔氏家学的核心,更是天下之学,即孔氏家学乃天下之学,孔氏家法乃世之“道法”。作为孔氏家学,五经和《论语》或为先祖孔子著述,或为孔子删定,乃是孔氏子弟的“阐教之书”,无论是诵之还是释之,都是承继家学;作为天下之学,五经和《论语》乃是载道明理、“化成天下”之书,同时也是天下人的“阐教之书”,诵之释之,乃意味着崇儒重道。因此,孔氏子弟恪守祖训、传习祖书,实则肩负着传承家学、延续至圣之道,乃至“以承道统”<sup>[5]719</sup>的崇高使命。其次,作为家学传承,孔氏子弟传习祖书主要有两种方式:诵经和释经。诵经即直接诵读五经和《论语》之文,“对此,衍圣公以下无不终身奉行,矢志不移,清初衍圣公孔毓圻之子孔传铎弥留之际尚命其子孔继浩诵读《论语》信近于义章给自己听,其有别于世俗遗嘱多矣”<sup>[61]</sup>。释经则是通过汇集整理前人著述或训解家藏经义来深化理解,孔氏子弟在释经方面成果丰硕,如秦孔鲋的《论语义疏》<sup>[6]100</sup>、汉孔安国的《尚书注》、唐孔颖达的《五经正义》、宋孔武仲的《论语说》、清孔传铎的《春秋三传合纂》、孔广森的《春秋公羊考释》《礼学卮言》等,都对经典做了独到解读。

这两层含义共同揭示了孔氏家学的深厚底蕴和广泛影响,以及孔氏子弟治经以传承和发扬家学的不懈努力和取得的卓越成就。

### (二)诗礼之教

诗礼之教,即“诗礼传家”,乃孔氏家族世代相传的祖训家规,其渊源可追溯至孔子。孔子曾言“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sup>[7]81</sup>,并以此理念教育孔鲤。《论语·季氏》载:“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sup>[7]178</sup>其后,题为孔子第八世孙、秦代孔鲋所撰的《孔丛子·杂训》载:“子上杂所习,请于子思。孔白,字子上,子思之子也,杂者,诸子百家。子思曰:‘先人有训焉:学必由圣,所以致其材也;厉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于《诗》《书》而终于《礼》《乐》,杂说不与焉。又何请?’”<sup>[8]19</sup>此后,诗礼之教逐渐在孔氏家族中蔚然成风,并作为家规祖训被正式确立。如明代衢州知府沈杰在正德元年为衢州孔氏制定家规,旨在推动孔氏子弟研习诗礼,树立士林典范,其言曰:“恐后在衢子孙繁衍,愚哲不同,诗书少习,礼义或乖……无以倡帅文教”,所以,“修家规七款”<sup>[9]15</sup>。几十年

后,即万历十一年(1583年),孔子六十四代孙、衍圣公孔尚贤主持制定了孔氏家族史上的第一部成文族规——《孔氏祖训箴规》,共计十条。其中第三条言:“崇儒重道,好礼尚德,孔门素为佩服。为子孙者,勿嗜利忘义,出入衙门,有亏先德。”第十条言:“祖训宗规,朝夕教训子孙,务要读书明理,显亲扬名,勿得入于流俗,甘为人下。”<sup>[10]18</sup> 这两条着重强调了崇儒重道、好礼尚德的家风。尽管《孔氏祖训箴规》未见于《孔子世家谱》等文献,但它被广泛颁行至各地分支,成为制定家规的纲领。如乾隆时期福建建宁县三滩孔氏家谱祖规更是将其置于家谱之首,并进一步明确诗礼传家的要求:“读书。祖为万世师表,后裔稍有聪颖者,春夏教以礼乐,秋冬教以读书。毋得玉蕴于璞荡失先业。是所望于贤父兄之留意。”<sup>[10]22</sup>

“诗礼之教”更是历代朝廷对曲阜孔氏宗族的殷切期许。宋太宗在赐封孔宜为文宣公的诰文中,勉励他“勉遵家法,以荷国恩”<sup>[11]天16</sup>,强调恪守家规,以报国家之恩。金章宗完颜璟在赐封孔子五十一代孙孔元措的诰文中,也提醒其“家声久矣,无忘诗礼之传,学有余师,善将终誉”<sup>[11]天11</sup>,期望其继续传承诗礼传统,光耀门楣。孔府档案0006号《成化年间修刊孔氏宗谱(一)》中,记载有朱元璋与孔子五十五代孙祭酒孔克坚的一段对话:“元年十一月十四日,谨身殿内,上对百官,谕孔子五十五代孙祭酒孔克坚,曰:‘老秀才近前来,你多大年纪也?’对曰:‘臣五十三岁。’上曰:‘我看你是有福快活的人,不委付你勾当,你常常写书与你的孩儿。我看资质也温厚,是成家的人。你祖宗留下三纲五常,垂宪万世的好法度,你家里不读书,是不守你祖宗法度,如何中。你老也常写书教训着,休息惰了。于我朝代里,你家里再出一个好人呵不好?’二十日,于谨身殿西头廊房下奏:‘上位曲阜进表的回去,臣将主上十四日戒谕的圣旨,备细写将去了。’上喜曰:‘少吃酒,多读书。’”<sup>[12]147</sup> 这段对话生动地再现了明太祖朱元璋给孔克坚提出“诗礼传家”要求时的情景,展现了朝廷对“诗礼传家”的重视。朱元璋关切地询问孔克坚的家教,并指出家中不读书即是不守祖宗法度,强调要常写书教导子女,保持家族的优良传统。清代乾隆帝多次亲祭孔子,对七十一代孙孔昭焕寄予厚望,希望他“修己无过守礼乐”“克继家声慎勸旃”,并亲笔题写“诗书礼乐”匾额,御制《诗礼堂赞》赐给他,以示嘉勉。诗曰:“昔者趋庭,诗礼垂训。维言与立,伊谁不奋。九仞

一篲,愿勉乎进。御堂听讲,景仰圣舜。”<sup>[13]906</sup> 孔繁浩入京陪祀时,咸丰帝御制诗章赐给他。诗曰:“曾向宫墙荐德馨,高山向往景前型。千秋入睹衣冠化,一代天钟海岳灵。诗礼泽长庭有训,粥饔风古鼎留铭。时清尚染浇漓俗,愿藉家传铎唤醒。”<sup>[14]4</sup> 在诗中,咸丰帝称赞其家族的诗礼传统,并期望其能借助家传唤醒世人的道德意识。这些来自朝廷的期许和告诫,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为曲阜孔氏宗族坚守和发扬“诗礼之教”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文人儒士对圣人的敬仰和对道统传承的期望,也推动了曲阜孔氏后裔在“诗礼之教”上的不断传承。明代的《衢州府志》就记载了当时人们“见圣孙如见圣祖”<sup>[15]394</sup>的情感,这种情感在杨士奇的《鲁林怀思图诗后序》中也得到了印证。其言:“公卿大夫以及韦布之士遇孔子之后,亦莫不厚敬爱以相接,不敢众人视之。”<sup>[16]34</sup> 在诗中,杨士奇描述了无论公卿大夫还是普通士人,对孔子后人都怀有深厚的敬意,不敢轻视。从宋代的蔡襄,到元代的柯丹丘,再到清代的史夔,他们的诗词中也都充满了对孔氏宗族诗礼传家、承续道统的期待。蔡襄的诗句“里闾高高祖德新,鲁庭诗礼孟家邻”<sup>[17]370</sup>,描绘了孔氏家族的新气象和诗礼传家的风采;柯丹丘的“诗礼传家忝儒裔,先君不幸早倾逝”<sup>[18]1</sup>,表达了对诗礼传承的自豪和对先辈的怀念;史夔的《诗礼堂》诗写道:“缅想趋庭日,栖栖数亩宫。斯文应不坠,吾道岂终穷。礼乐仍周典,诗书尚鲁风。入门观揖让,顿觉此心融。”<sup>[19]75</sup> 通过缅怀孔氏家族的趋庭教化,表达了对礼乐制度、诗书传统的尊崇和向往。这些诗词生动地展现了文人儒士对孔氏子弟的仰慕和对孔氏“诗礼之教”的赞誉。

“诗礼之教”与孔氏宗族对科举功名的重视紧密相连。正如学者所指出:“山东仕宦家族大多以农耕起家,多数经历了由一般农民致富而成为地主,其成员再经过科举获取功名,从而成就家族的显赫地位。因此,尤其重视对家族子女的培养教育,重视科举、重视功名而成为这些家族最重要的选择。”<sup>[20]5</sup> 尽管孔氏宗族因孔子的特殊地位而区别于其他家族,但科举功名作为一种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甚至政治象征符号,对孔氏子弟个人及整个宗族的稳定繁荣、政治影响力、社会声望和经济状况均有着显著影响。因此,孔氏宗族从个人到整体都极为重视科举。而诗礼传家教育,涵盖了诗、礼、乐等多方面的内容,为科举考试奠定了坚实基础。



这解释了为何孔氏祖训中常有“务要读书明理,显亲扬名”的训诫。以清代福建建宁县巧洋孔氏族规为例,其第一条便是强调“作兴文学”。言曰:“文举(学)为宗族首重,不可不加意作兴,故家课宜行也。”要求“课,清明、端午、中秋,冬至后期一日。届期,无论生、监、儒童,除五十以上,十三以下,听不与课外,各于黎明,携纸、墨、笔、砚,齐集祠堂,尊长、族正命题,头家值饷,面课二艺”<sup>[10]23-24</sup>。族规详细规定了家课的执行方式,包括时间、参与人员、命题、成绩评定以及奖罚措施等,甚至对家贫子弟的学费和科举考试费用都给予了资助。这些规定充分展示了孔氏宗族对科举功名的重视,以及通过诗礼教育为子弟科举之路提供坚实支撑的决心。

基于上述原因,无论留守原籍还是移居外地,孔氏子弟均自觉恪守“诗礼之教”的准则。元代时,孔子五十三世孙、衍圣公孔治在家宅内“作堂私第,命以诗礼,示不忘过庭之教”<sup>[5]717</sup>。明代洪武年间,孔子五十六世孙、衍圣公孔希学更在家庙前、燕申门北建造“诗礼堂”<sup>[5]72</sup>,作为讲学之所,传承诗礼文化。清代,孔子六十七代孙、衍圣公孔毓圻更是盛情邀请孔尚任教授礼乐,其规模宏大,影响深远。孔尚任《出山异数纪》载:“康熙壬戌秋,予家六十七代大宗衍圣公毓圻束书加币,敦予出山,治其夫人张氏丧。明年春,即延任祖庭修家谱及阙里志,并选邹鲁弟子秀者七百人教以礼乐,更采访工师造礼乐祭器。至甲子秋,皆竣,合宗族万人释菜于庙,告备也。”<sup>[21]17</sup>孔尚任作为孔子第六十四代孙,不仅精通礼仪音律,还擅长诗文戏剧创作。当康熙帝亲临阙里祭奠孔子时,孔尚任在诗礼堂为他讲解《大学》《中庸》,展现了他深厚的诗礼造诣和经学功底。实际上,历代衍圣公和阙里孔氏子弟创作了大量诗文作品,不少人在文学史上留下了赫赫声名,如孔巢父、孔延之、孔文仲等人。姚金笛在《清代曲阜孔氏家族诗文研究》一书中便列举了清代孔氏147位男性作家,充分展现了“诗礼传家”的祖规对阙里孔氏一族的深远影响。这些人不仅继承了先祖的诗礼传统,更通过他们的创作,将这一传统发扬光大,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孔氏家族所倡导的“诗礼之教”,本质上是对孔子“六艺”教育思想的传承与发展。《周礼·地官·保氏》言:“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sup>[22]139</sup>孔子深受周代礼乐文化熏陶,不仅自身精通六艺,更将其作为教育弟子的核心理念,强

调“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所谓“艺”即为《周礼》中的“六艺”。他对儿子孔鲤的教诲“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便是这一思想的生动体现。孔子还亲自修订《礼》《乐》,订正《诗》《书》,作《易传》,著《春秋》,将其作为“六艺”教育的核心教材。随着时间的推移,“六艺”逐渐由指礼、乐、射、御、书、数六种基本技能转变为能够涵盖这些技能的教材体系,即“六经”。司马迁在《史记·滑稽列传》中言:“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sup>[23]3197</sup>这就明确将“六经”作为“六艺”。在此意义上,“诗礼传家”实质上就是“六经传家”,它承载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精髓,推动了以诗、礼、乐、舞为主要内容的道德伦理教育,这正是“诗礼传家”教育的核心所在。

“诗礼之教”即“六经传家”,深刻展现了它与前文所述“首在治经”之间的紧密联系。简而言之,“诗礼”是技能,为用;“经”则是这些技能的培育载体,“治经”为学。将“治经”与“诗礼”相结合,不仅真正体现了儒家的精神内核,也完成了儒学的崇高使命。这一理念对中国古代各大世家和儒士文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清代著名人物曾国藩为例,他极为重视家学传承。从他对本族子弟的教育言论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治经为学,诗礼为用,世显儒先,诗书其业”的观念贯穿其中。这充分证明了“诗礼之教”与“治经”相结合的教育理念在儒家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及其深远影响。

### 三、孔氏家学的本质

孔氏家学,本质上是在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经过孔氏家族成员长期积淀而形成的一种文化心理结构,它源于对先祖孔子的深厚崇拜。这种家学以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形式,在治学对象、方法、思想观念、情感形态、思维模式以及家族成员性格等方面得以存在和呈现。它规范着孔氏家族成员在特定领域的理性认知和感性价值取向,是孔氏家族共有的精神财富和行为准则。

孔氏家学的根源在于对先祖孔子的崇拜,这种崇拜是在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外因主要源自中国王朝政治的影响,而内因则根植于孔子思想学说的内在魅力及孔氏家族的家庙祭祀传统。孔子及其儒家学派所倡导的,是以礼乐为核心的圣王之道,这与王朝政治对现实政治功利的追求在某

种程度上形成互补。当王朝政治与圣王之道实现统一,哪怕仅仅是形式上的统一,无论是王朝还是儒家文士,都能实现利益的最大化:皇朝帝王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掘儒家教统的利用价值,让孔子神灵也为其政治统治忠诚效力”,儒家文士则可以最大限度地“张扬、提高其在政治上的实质性地位”,“借此达到其制约王权、追求王道理想的政治目的”<sup>[24][187]</sup>。因此,从西汉至明清,王朝政治与圣王之道的统一不断被王朝最高统治者和文人儒士付诸实践。主要方式包括:构建道统和教统,凸显孔子传教明道的功德作用;赐予孔子尊崇的封号,提升其在政治领域的地位;将孔氏家族的家庙祭祀升格为国家层面的释奠仪式;优待孔子后裔,使其饮水思源,感念祖宗孔子恩德。

西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树立了儒家在道统中的正统地位,其他学派则为异端邪说。至唐宋明清,儒学文士更是延续此传统,构建了完整的道统体系。教统作为道统实现的途径,虽然源远流长,但真正得以展开却始于孔子。在儒学文士所构建的道统和教统中,孔子不仅是儒家的创始人,更是教统的典范,他接续了“圣王”之道。儒士们称三代之后,大道废弛,孔子“应历而兴,乘时而济,为斯道衍宗脉,为万世开太平”。通过宣扬孔子的功德,他成为了道统和教统的核心人物。

与之相应,王朝统治者不断提升孔子的地位,甚至将其神圣化,旨在彰显其卓越功绩与尊贵地位。孔子的封号经历了从“尼父”(严格说,鲁哀公称孔子为“尼父”,应只是尊称,并非封号)到“宣尼公”(西汉)、“褒尊侯”(东汉)、“文圣尼父”(北魏)、“邹国公”(后周)、“先圣”“文宣王”(唐)、“玄圣文宣王”“至圣文宣王”(宋)、“大成至圣文宣王”(元)、“至圣先师”(明),再到“大成至圣文宣先师”(清)等变迁。然而,尽管西汉武帝时独尊儒术,平帝封孔子为“宣尼公”,东汉和帝封孔子为“褒尊侯”,但至东汉末年时,孔子也只是尊而不贵。与春秋时期相比,“儒家孔子的地位并没有明显上升”,“此时,孔子子孙的受封,不是因为孔子,而是因为他们为殷人之后。汉代封殷人之后是为了保存‘存灭国,继绝世’或存三统的传统”<sup>[25]</sup>。汉孔安国《尚书序》中的记载亦印证了这一点。《尚书序》载:“至鲁共(注:应为“恭”)王,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及《传》《论语》《孝经》,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闻金石丝竹之音,乃不坏宅,悉以书

还孔氏。”<sup>[26]3</sup>鲁恭王破坏孔子旧居,后闻金石丝竹之音,才停止破坏并归还藏书,此事亦反映出孔子在汉代的地位并不崇高。

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孔子的地位开始逐渐上升,北魏时更被溢为“文圣尼父”,显露出神圣化的迹象。唐贞观二年(628年),太宗将孔子尊为“先圣”。开元二十七年(739年),玄宗更封其为“文宣王”,并改变其坐向,孔氏子弟亦开始袭封公、侯、伯爵位,孔子的身份得到了根本性改变,被推至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科举制度的推行则进一步强化了孔子的神圣地位。宋及以后,孔子的头衔中添加了“玄圣”“至圣”,地位进一步提升。至明清时期,尽管朝廷对孔子的态度有所变化,但其神圣化的地位已牢不可破,康熙帝亲至曲阜阙里祭奠孔子,行三叩九拜之礼,足见孔子在历代朝廷统治者心中的崇高地位。可见,王朝统治者不断提升孔子地位的历程,实则是一个不可逆的神圣化孔子的过程。

同时,历代朝廷统治者在儒学文士的建议下,逐步提升对孔子的祭祀规格,从孔氏家族的家庙祭祀和儒学文士的零星祭拜,逐步上升为国家层面的释奠大典。孔子去世后的数百年间,弟子及儒学文士、地方官员等曾陆续前往祭拜。司马迁《史记》载:“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则哭,各复尽哀;或复留。唯子赣庐于冢上,凡六年,然后去。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命曰孔里。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顷。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高皇帝过鲁,以太牢祠焉。诸侯卿相至,常先谒然后从政。”<sup>[23]1945-1946</sup>宋代的孔传《东家杂记》也言:“自孔子没,子孙世为鲁人,同居祖庙。”<sup>[27]3</sup>因此,司马迁所谓“鲁人”当包括孔子后世子孙在内。这表明当时的祭祀活动主要限于孔氏家族的庙祭及部分私人祭祀,且多在孔子墓地进行。这可能与当时的宗法制度有关。根据当时的宗法律制,“不同阶层人群祭祖的代次、神主规制均有严格限定。只有天子、诸侯、贵族等人方有资格建造家庙祭祖,寻常民众只能祭于寝。同时,祭始祖之权掌握在周天子等少数人手中,庶人止于祭祢即先父一代而已……上述定义和讨论,固然也可适用于阙里孔庙,却远不能尽括其自身特性。阙里孔庙的原初形态,本是孔子逝后,子孙后代因宅立庙,祇奉先祖之所”<sup>[28]</sup>。如果孔氏家族当时是普通百姓人家,当没有资格建造家庙祭祖。

然而,孔子作为儒家的创始人,教统的接续者,其德业盛隆,地位特殊。司马迁在《史记》中虽言“孔子布衣”“贫且贱”,但却又列入“世家”。所以,唐代的司马贞索引“孔子世家”几字言:“孔子非有诸侯之位,而亦称系家者,是以圣人为教化之主,又代有贤哲,故称系家焉。”张守节正义“孔子世家”几字言:“孔子无侯伯之位,而称世家者,太史公以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宗于夫子,可谓至圣,故为世家。”<sup>[23]</sup><sup>1905</sup>因此,孔子的后人将他的故居改为孔庙,专供孔氏族人祭祀,只不过当时“孔子之庙不出阙里”。此种情况在祭祀孔子仪式上升为国家释奠后方才改变。不过,据学者们考证,至东汉初年,孔子祭祀还不是国家释奠。东汉末年时,桓帝在孔庙始置官(百户卒史),灵帝则“诏祀孔子依社稷,出王家谷,春秋行礼”<sup>[5]</sup><sup>171</sup>,祭祀孔子的仪式才升为国家祭祀,初步建立常祀孔子的制度。此后,经魏晋南北朝“若干朝代的实践,天子视学释奠、太子通经释奠、立学释奠、春秋二仲释奠、学官月朔行礼等几种常见的释奠制度基本完备”<sup>[25]</sup>。唐宋金元等朝代则进一步完善了这一制度,使得对孔子的祭祀成为国家层面的重要典礼。

随着孔子地位的逐步提升和祭祀形式的演变,孔氏子弟对孔子的感情态度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最终升华为对先祖孔子的崇拜。在唐代之前,尤其是孔子祭祀尚未成为国家常祀之际,孔氏子弟虽对孔子怀有深厚的敬慕之情,但只是将孔子作为有德业的先祖,并未将其提升至祖宗崇拜的高度。这从唐前孔氏子弟对孔子的称呼中可见一斑。秦代孔鲋在其《孔丛子》中记载了孔子与子思的一段对话:

夫子闲居,喟然而叹。子思再拜,请曰:“意者子孙不修,将忝祖父乎?抑美尧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孺子焉知吾志!”子思对曰:“伋闻夫子之教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负荷’,伋闻之,大恐而不懈也。”夫子欣然笑曰:“然乎?吾无忧矣。”<sup>[8]</sup><sup>17</sup>

从对话中可以看出,孔子在世时,子思侍奉其侧,因孔子中继尧舜之道,子思亲切地称孔子为“祖父”,表现出对孔子的亲近与敬慕。而秦代的孔鲋则称孔子为“子”“孔子”和“先君”,汉代的孔安国亦称之为“孔子”“先君孔子”,这些称呼少了亲近,透露出的是对先贤的敬重,而非神圣化的膜拜。随

着王朝统治者赐予孔子的封号日益尊贵,孔子逐渐被神圣化,祭祀孔子成为国家常祀,孔氏后裔的态度亦随之转变,开始“圣化”并膜拜先祖孔子。唐代是一个转折点,孔氏后裔对孔子的称呼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贞观二年,太宗赠孔子为“先圣”,孔氏后裔如孔颖达随之尊称孔子为“圣祖”“先圣”。宋元明清时期,朝廷不仅定期举办祭祀祀典,而且典仪隆重肃穆,进一步强化了孔氏子弟对先祖孔子的崇拜。在称呼上,除了延续唐代的“圣祖”“先圣”外,孔氏后裔还常用“孔圣”“至圣文宣王”“文宣王”“至圣先师”等尊称。此外,孔氏家族还编写了诸如《东家杂记》《孔子家谱》《阙里志》《阙里文献考》等大量史志著作,以彰显和强化其圣裔身份,这无疑自唐代以来对先祖孔子崇拜的深刻体现。

孔氏家学一经形成,便深刻影响了孔氏族人的治学之路。孔子家学旨在承续孔子圣王之道,其核心内容在于治经史、诗礼传家。无论是孔毓圻标举诗文须明道或诗礼乐舞并举,还是其前孔氏子弟们训释五经,均以此为标准的,充分体现了孔氏子弟对先祖孔子的崇拜。他们或著书立说,或考释经义,或吟诗填词,将诗文视作承继孔子道统的重要载体,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先祖孔子的膜拜之情。孔广森在《春秋公羊经传通义序》开篇即言:“昔我夫子有帝王之德,无帝王之位,又不得为帝王之辅佐,乃思以其治天下之大法,损益六代之礼乐文质之经制,发为文章以垂后世。”<sup>[29]</sup><sup>序1</sup>孔庆镛在《阙里孔氏词钞序》中也提道:“词者,诗之余,孔氏秉趋庭之训,二千余年来,诗学绍承,著作宏富。”<sup>[30]</sup><sup>孔序1</sup>由此可见,孔氏对先祖的崇拜之情,可谓举世无双。

## 参考文献:

- [1]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4.
- [2]国语[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0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3]孔毓圻,孔尚任.孔子世家谱[M].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修.
- [4]孔继汾.阙里文献考[M].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刊.
- [5]徐振贵,孔祥林.孔尚任新阙里志校注[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 [6]周洪才.孔子世家艺文志[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
- [7]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 [8]孔鲋.孔丛子[M].崇祯六年(1633年)刻本.



- [9]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明代档案史料[M]// 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 济南: 齐鲁书社, 1980.
-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清代档案史料[M]// 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 济南: 齐鲁书社, 1980.
- [11] 孔元措. 孔氏祖庭广记[M]// 四部丛刊续编(第86册). 上海: 上海书店, 1985.
- [12] 孔子博物馆藏孔府档案汇编委员会. 成化年间修刊孔氏宗谱[M]// 孔府档案丛编(明代卷第1册).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8.
- [13] 路承烈. 石头上的儒家文献——曲阜碑文录[M]. 济南: 齐鲁书社, 2001.
- [14] 孙永汉, 等. (民国)续修曲阜县志[M]. 济南: 济南同志印刷所, 1934.
- [15] 林应翔. (天启)衢州府志[M]// 黄灵庚, 诸葛慧艳. 衢州文献集成(第29册).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5.
- [16] 杨士奇. 东里文集[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8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 [17] 蔡襄. 端明集[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0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 [18] 朱叔. 新刻原本王状元荆钗记[M]. 姑苏叶氏明代抄本.
- [19] 沈炼. 青霞集[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78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 [20] 朱亚非, 梁娟娟, 李瑶, 等. 明清山东仕宦家族与家族文化[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9.
- [21] 孔尚任. 出山异数纪[M]// 丛书集成续编(第40册). 上海: 上海书店, 1994.
- [22] 林尹. 周礼今注今译(下)[M].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9.
- [23]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24] 刘志伟. 两汉王朝政治中的王统与教统关系: 以宗庙祭祀、孔庙祭祀与孔子崇拜为考察中心[J]. 中州学刊, 2010(2).
- [25] 陈东. 释奠制度与孔子崇拜[J]. 国际儒学研究, 2007(00).
- [26] 孔安国. 尚书序[M]// 尚书. 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武英殿仿宋刻本.
- [27] 孔传. 东家杂记[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6.
- [28] 孔勇. 清代衍圣公家祭研究[J]. 清史论丛, 2021(1).
- [29] 孔广森. 春秋公羊经传通义[M]// 阮元. 皇清经解. 广东学海堂道光九年(1829年)刻本.
- [30] 孔庆镛. 阙里孔氏词钞序[M]// 孔昭薰. 阙里孔氏词钞. 道光十八年(1838年)玉虹楼刻本.

## Confucian Family's Learning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ism (Part I)

Ji Yuzhen<sup>a</sup>, HUO Junguo<sup>b</sup>

(a. Library; b. School of Literature,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273165, China)

**Abstract:** The formation of Confucian family's learning has undergone long years, evolving from its embryonic stage before Confucius, to the Confucian establishment stage, and then to the development and perfection stage from the Qin Dynasty to the Tang Dynasty, and finally to the prosperous stage from the Song Dynasty to the Qing Dynasty. Confucian family's learning has continuously developed and grown, forming a unique cultural system. With the transmission of Confucian way as its core, Confucian family's learning covers many fields such as Confucian classics, history,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Its content mainly consists of two aspects: studying the classics and teaching poetry and etiquette. Essentially, Confucian family's learning is a cultural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formed through long-term accumulation under the combined action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It originates from the profound worship of Confucius.

**Key words:** Confucian family's learning; Confucian way; worship of Confucius; Confucianism

(责任编辑 陇 右)